

· 高等教育史 ·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的八大特色

程 斯 辉

(武汉大学 教育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八大特色。即把握大学使命, 彰显大学精神, 办理想、境界高远的大学; 尊重学术研究规律, 维护学术尊严, 办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大学; 重视学校管理的建章立制, 办运行有序的法制化大学; 注重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 构建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大学; 严格培养过程管理, 努力办高质量的大学; 既重视开源, 更重视节流, 办节约型大学; 集中力量, 形成优势, 办有特色的大学; 通盘筹划学校发展, 创建环境优美、校风纯正的大学。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特色蕴含着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基本规律, 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国近代; 大学校长; 办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08)02-0083-07

Eight features of school-running by famous Chinese university presidents in modern times

CHEN G Si-hui

(School of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Famous Chinese university presidents in modern times have established eight features in running university: hold firm university mission to display vigorous university spirits, and run a university with ideal and vision beyond earthliness; abide by the law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eserve academic dignity to establish a university with freedom and resilienc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ystem-building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to secure a legitimate-run university; favor school-running by professors and self-running by students so as to construct an active and democratic university; stricke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a high quality university; not only emphasize on gaining resources but also reducing expenditure to set up a conservation-conscious university; pay attention to forming unique strength to ensure a university with outstanding mark; make a comprehensive plan of development to beautify its campus and cultivate healthy atmosphere. As these features contain the basic law of running a university, they bear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o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importance.

Key words: modern China; famous university presidents; school-running features

收稿日期: 2008-01-08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课题批准号 DAA070170)

作者简介: 程斯辉(1962-), 男,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教育发展史与教育管理研究。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大学校长(人们有时也把他们称之为杰出的或优秀的大学校长),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宝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等等。他们的办学理念鲜明高远,体现着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他们的治校方略实际可行,蕴含着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他们在治校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大批为社会所需的优秀人才,而且竭力倡导着大学的科学研究与文化创新,在艰难的岁月里努力服务社会并试图肩负起引领社会发展的重任。他们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进程中教育家办学的典型。总结、概括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特色,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握大学使命,彰显大学精神, 办理想、境界高远的大学

为什么要办大学,办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在办大学过程中应当弘扬什么样的精神或用什么样的精神来办大学,作为大学校长对这些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位对大学使命、大学精神没有清醒认识的校长,是不可能指望他办出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高水平的大学的。在近代艰难的岁月里,一批优秀的大学校长之所以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办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大学承担的使命和肩负的历史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一般而言,大学校长对于大学负有的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的任务是能够把握的,但近代杰出的大学校长,不是把大学的使命简单定位在为社会培养专门人才上,或定位在培养适应社会的人才上,而是定位在培养改造社会、引领社会发展的领导人才上,定位在培养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领袖人物上。张伯苓之所以办南开大学,是要培养引领中华民族步出迷津的领袖;竺可桢临危受命出掌浙江大学,是因为他坚信大学是“社会之光”,是“海上灯塔”,^[1]大学要承担起培养领袖、引领社会发展的责

任;李登辉则期待通过大学教育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导者。因此这些著名大学校长都重视对学生人格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养人格高尚、健全的人才。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不是简单地将学术研究定位在学术的整理与传承上,而是要通过学术研究培养有研究能力的创新人才,并尽可能地通过学术研究产生学术大师,使高校有一流的学术人才,能够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与世界知名的学者进行同等的交流,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互惠。为了培养学生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本领,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陈裕光、吴贻芳等在艰苦的条件下和恶劣的环境里都将学生的实习、实践、调查等课程化、学分化,使大学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为了完成大学的使命,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不遗余力地提倡追求真理、崇尚正义、牺牲奉献的精神,不遗余力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的文化传统。在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的领导下,中国近代大学实现了由传统的培养官吏之场所向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转变;实现了由传统的依附于政府的官僚系统向拥有大学独立“人格”的学术组织转变;实现了受教育者为小我、为自己读书向为大我、为民族、为社会读书的转变;实现了由相对封闭到对外开放、追赶世界潮流的转变。正是近代杰出的大学校长们努力创办理想境界高远的大学,才使得今人在回首他们办学历史时依然激动和感动,并充满敬意。

二、尊重学术研究规律,维护学术尊严, 办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大学

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都认识到了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仅是近代大学与中国古代大学的区别之所在,而且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他们在倡导学术研究过程中高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旗帜。同时他们在反思中华民族之所以落伍、被动挨打的原因时,一般将教育的落后、科学研究的落后作为重要根源。故他们在办大学的过程中,不仅鼓励、支持师生从事科学研究,而且在大学里创办科学研究机构,使中国近代大学基本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并重,使得大学的科学研究,不仅表现为师生的个体行为,而且表现为团体行为,使他们所主办的大学的科学研究没有停留在师生自发的行为上,而是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在提倡和支持学术研究时,反对将科学研究局限在校园内、实验室里,而是鼓励师生的科学研究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急需。他们在办学治校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处理好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关系,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扩大学术交流。他们创办多种学术研究刊物,支持出版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丛书,给从事研究的师生创建展示科研成果的平台,这就使他们所主办的大学逐渐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校长利用自己治校的权力创造和保护了学术研究、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自由环境与氛围,强调学者可以自由地表达见解,学派能够自圆其说还未达淘汰之境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他们允许师生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观点进行争论、争鸣,而不加以干涉。这就使他们所主持的大学的师生有环境宽松自由之感,因而师生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师生的创新成果也就不断涌现。在中国近代大学,一些学术大师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已成为许多学科的奠基之作。

近代杰出的大学校长在维护学术独立上,还勇于与政府不合理的干预行为进行抗争,与干扰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宗教势力、守旧势力、党派利益进行抗争,努力使大学的学术研究保持独立性。还要指出的是,在支持、鼓励大学的学术研究上,近代一些大学校长以身作则,在治校之余潜心学术,像蔡元培、陈垣、胡适、竺可桢、熊庆来等等,他们既是杰出的校长,又是一代学术宗师和著名科学大家;既是杰出的管理者,又是近代大学的学术领袖,并真正起到了领导学术发展的作用。

三、重视学校管理的建章立制, 办运行有序的法制化大学

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是一个政局动荡、战争不断的社会。近代一些优秀而杰出的校长深刻认识到了在这样变化不定的环境里办学,校长之岗位可能随时更迭,必须为大学的发展寻找长远之策,使大学的运行不要受校长和少数人去留的影响。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为使学校平稳发展所寻找到的长远之策就是使大学法制化,即使大学发展建立在有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在治校过程中特别注重学校管理的制度建设,注重提升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纪律意识、规则意识,注重加强学校内部的组织机构建设,并使这种组织机构的建设

立于制度保障的基础上。正如张伯苓所言:“本校政策即将学校作成——法制学校,总不使一人去留影响于全校,……各事既有秩序,则无论何人视事均能依旧进步。其能力强者可扩充之,虽较弱者亦无退步之虞。”^[2]本着这种治校精神,在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上,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不仅善于继承中国古代大学严格管理的优良传统,而且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管理经验,同时创造性地结合当时社会的情形制定符合国情与校情的规章制度。在制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这些校长既注重学校管理的纲领性法规如学校章程的构建,也重视具体工作规则的确立。这样就使他们主持的大学在管理上形成了学校立法、行政、监督分权,行政、学术分工,全局与局部结合,整体与具体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就使学校的运转形成了即使少数主管不在,也能照章办事、照常运转的格局。

在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建设上,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一方面主张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学校管理组织机构建制的创新,譬如增设教务管理、学术管理机构,注重群众性民主组织的设置,注重保证学校决策科学化的评议机构、参议机构的设置等等,使近代大学行政组织开始趋于扁平化,改变了过去大学组织明显的科层化、官僚化特征。对大学组织机构进行制度创新,使大学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执行具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如果一所大学制定了好的学校管理规章制度,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但是学校管理者尤其是校长没有法制意识、没有纪律意识,那么大学里的这种制度建设就是纸上谈兵,学校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就会落空。因此,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在加强学校管理规章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创新的同时,对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反复进行法制意识、纪律意识、规则意识的教育,同时自己坚守学校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应该说经过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的努力,近代一些大学的确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明显的标志有:大学校长既使离开大学较长时间,从事社会活动和出国访问等等工作,学校依然能够照常运转;大学内部的各种纷争可以依靠自身的制度加以解决;大学与外部的冲突也可以靠自身的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调适。

可以说,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办运行有序的法制化大学的设想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这对改变大学的人治色彩,保障近代大学在变化不定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平稳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注重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 构建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大学

如果说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过程中注重制度建设,是要改变以往大学管理的人治色彩,改变大学因校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状况;那么,他们在办学治校过程中重视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则是要改变以往由校长等少数人决定学校命运的状况,即改变大学管理的专制性,从而使大学管理走向民主化道路,同时也意在改变过去大学生以天之骄子自居养成依赖之心、要人服务的状况。就重视教授治校而言,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将大学教授不仅视为教书育人的教育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者,而且视他们为学校的管理者,校长决策的参谋智囊人物。梅贻琦认为大之所以为大的关键要素在于大学有“大师”,他提出了“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3]的著名观点;竺可桢则坚信“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4]因而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非常尊重大学教授,爱护教授,像梅贻琦那样,到了“爱师如命”的地步。^[5]他们不仅竭力为教授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而且为他们搭建成就事业、参与校政的平台。

近代大学校长倡导的教授治校体现在办学的方方面面,大到学校重大事务,小到具体的工作环节,再到学校里的各项工作,校长们不仅在决策之前要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而且决策之后也会委托教授们加以落实和执行。这就使中国近代大学管理呈现出一个普遍的特征,即大学管理人员的兼职化。尽管教授们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但由于管理者把教授们真正当作学校的主人,教授们的主人翁意识被激发出来,因而他们一般都能很好地处理教学、科研与管理的矛盾,并把自己的命运和学校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当学校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或事故,教授们都能主动担负稳定学校、化解矛盾的责任。

就学生的自治而言,由于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办学不是简单地培养适应社会、谋得一份工作,能够解决个人生计的人才,而是要培养改变社会风气、引领社会发展、振兴民族的领袖人才,因此他们在要求学生有规则、有纪律意识的同时,特别强调学生自治,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通过支持学生的社团活动来培养学生成为未来领袖人物应具备的组织管理能力、协调能力、雄辩能力、服务社会的能力;在社

团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涵养和丰富学生高尚的志趣与情趣。在倡导和支持学生自治的过程中,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还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注重在学校管理中征求和吸纳学生意见,因而激发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在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管理的大学中,大学生们不再是被动的受教育对象,也不再是只知服从、惟师长之命是从的被管理者,他们开始主动关心学校的事务、关心社会、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积极主动地表达他们对学校管理、对社会局势的看法。尽管学生在参与学校管理、参与社会运动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出不成熟、易冲动、易走向极端等不足,但这些优秀校长一般都能从爱护学生、保护学生的角度出发,对学生进行引导,耐心地加以解释和沟通,因此能够消解学生的不理解或心理隔阂,进而赢得学生的尊重和拥护。

可以说,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通过倡导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使校长与教师之间、校长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形成了比较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但在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有些大学校长却认为让教授治校削减了校长权力,让学生自治,校长和教师就少有了权威,学校里就没有了师道尊严,因而在治校过程中取专制主义态度,进行集权式管理,搞少数人说了算,以此来维护校长的权威。但其结果,往往不被师生接纳,使校长与教师之间、校长与学生之间形成对立关系,最终酿出事端,对立的双方都受到了损害。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能够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表明他们充分理解了学校管理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专制与民主的关系。事实上,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治校经验说明:专制、集权形成不了权威,相反有损校长的威信;分权与民主削弱不了校长的威信,相反会进一步提升校长的权威。正是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使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激发,故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所治理的学校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校长也在提倡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的办学过程中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谋划学校发展的大局、大事,以新思想、新思路,运用新举措,来应对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的挑战,从而开拓学校发展的新局面。

五、严格培养过程管理， 努力办高质量的大学

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治校办学,理想远大,境界高远,但他们深知如果他们培养出的学生没有高质

量,就不可能完成和实现大学的使命。因此,他们把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放在工作的首位。具体来讲,在办高质量的大学上,他们强调学校行政管理的高质量、高效率;强调学生培养的全过程管理;强调教学活动的高水平、高质量;重视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全面训练。

在学校行政管理高质量、高效率的要求上,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努力构建小行政、大服务的学校管理体系,在处理学校的教学工作、学术工作、行政工作三者的关系上,他们认定教学工作、学术工作是主要的,行政工作是辅助的;同时强调学校行政工作在服务教学工作、学术工作时要取“效能主义”,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指出:“在一个大学里,行政机构应该是较小的一部分,而学术工作才是主要的一部分。不过行政机构如果不灵活,无论教书和学术工作,都要受到影响。”^[6]在处理大学教师、学生、职员与校长的关系上,蒋梦麟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主张,以协调和处理大学内各主体的关系。

在对学生的培养进行全过程管理方面,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从招考新生到学生入校后的报到注册、入学教育;从课程选修、课程考试到成绩评定;从学生实习实践到毕业就业,亦即从学生入校到毕业的各个环节莫不给予周到的安排和认真的筹划,每一个环节和程序都制定规则进行明示,这就使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整个过程都处于有人管理、有人操心的状态。这对于保障学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对待教师的教学方面,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的要求十分严格。这种严格首先体现在教师的选聘上,“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7];不仅选择愿意委身教育、不兼营他事的教师,而且选择愿意肩负起培养学生重大责任的教师;强调教师不仅要注重课堂教学,而且要重视课余与学生的交流;要求教师教学时不可照本宣科念讲义,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提出教师不仅要去做教育者,更要做学习者,努力进修提高,跟上科学、学术发展的步伐,做到既教且学,又教又学。

在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全面的训练方面,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可谓思想一致,都主张从德、智、体等多方面来培养学生,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个性与群性得到协调发展,体能、技能、智能得到和谐发展,进而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一个身体健

壮、心理健康的人,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专长、有道德、有高尚情操的人,成为一个有益于集体、他人和社会的人。为此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积极努力地为学生学习、体育锻炼、心灵陶冶创造条件。他们重视图书馆建设,让学生有书读;重视体育设施、场地的建设,让学生有地方锻炼;重视各种健康的娱乐活动的开展,让学生的心灵、情感得到陶冶和丰富。他们重视实验室、乃至实习基地的建设,以训练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在治校办学过程中将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放在首要位置,并采取切实的措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加以落实,这就准确地把握了办学治校的基本规律,使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的功能得到彰显,也使他们所主持的中国近代大学能在创办不长的时间里赢得较高的声誉。

六、既重视开源,更重视节流, 办节约型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是在近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中国近代大学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都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处于经费不足、半饥半饱甚至严重短缺的状况。因此,中国近代的大学校长,花去了许多的心力来筹措办学经费,向政府争款,发起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确保教育经费能够单独列支、专款专用,甚至率领师生上街请愿,要求政府拨付拖欠的办学经费等等,可谓殚精竭虑。尤其是近代私立大学的校长们,穷尽各种手段募捐化缘,为学校筹措办学经费,其精神可类比“武训”。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一般都勇于肩负起筹款的责任,不把筹措办学经费的任务交给大学各学院的院长或系主任,而是让大学各学院的院长、系主任们潜心教学与学术研究等业务工作的领导与指导。这是近代著名大学在办学经费紧张,甚至严重短缺时,还能维持基本的教学秩序、保证较高办学质量的重要原因。

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在广开学校经费筹措渠道,努力维持学校运转所需经费的同时,注重学校内部的财务管理,做到了既开源又节流。在节流方面,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坚持勤俭办学,对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贪大求全,不追求奢华气派,而是将实用、坚固、朴素作为衡量准则,一如王世杰主持建设武汉大学时坚持的:“坚固。避免奢华。在以上两个

条件下,充分求美术性表现”。^[8]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举债办学,以免支付昂贵的利息。在节流方面,他们还体现出量入为出,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的特点,房子一栋一栋盖,实验室一个一个建,建成则可为师生所用,不是注重建筑的外表和所谓的建筑面积,尽量避免有图书馆少图书资料、有实验室缺实验仪器的状况出现。为了保障有限的办学经费用在关键之处,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在学校经费的管理上重视预算和决算,做到有计划的支出,科学的支出,主动制定学校财务审计制度和经费支出报告制度,保证经费开支接受师生的监督。还要指出的是,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能够审时度势,对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勤俭办学的教育,培养师生的节约意识。他们向教师宣传安贫乐道的思想,教育学生过俭朴的生活,也是他们能治校办学过程中采取的重要节流举措。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不仅要求师生勤俭节约,而且以身作则,做勤俭节约的表率,他们压低自己应该享有的薪资,削减自己作为校长应享用的待遇标准,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办学或支助贫困的学生,或接济更加困难的教师。总之,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们在办学过程中注重开源和节流,较好地处理了经费的筹措与使用的关系。

七、集中力量,形成优势, 办有特色的大学

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在办学过程中没有平均用力,而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根据学校自身的办学传统和拥有的条件和自己的办学理想努力把学校办出特色。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在任上把学校办出特色的举措,可以从办学理念或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学校定位、专业建设、校园文化等方面来分析。像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上,不仅使该校在办学思想上形成了“兼容并包”、“网罗众家”、“思想自由”的特色,而且使北京大学形成了重视文理的学科特色。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的岗位上治校办学,不仅使清华大学形成了注重通才教育的人才培养特色,而且使清华大学的工科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清华大学工科教育的特色。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不仅使浙江大学的规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浙江大学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形成了目标高远、培育领袖的英才教育特色,使浙江大学形成了注重科学研究的特色,在校风建设上彰显“求是”精神的特色。像李登辉办复旦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形成了使复旦

大学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学科专业特色;陈裕光办金陵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不仅使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办出了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使金陵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发生紧密的联系,进而形成了金陵大学教学、科研、服务三合一的鲜明特色。武汉大学王世杰、王星拱、周鯨生三位校长都特别注重武汉大学的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建设,使武汉大学之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形成了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融为一体的特色。林文庆在办学过程中则形成了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陈垣执掌辅仁大学,使辅仁大学重视国语教育、国学研究的特色明显;吴贻芳在办学过程中在学生教育上营造出了富有亲情色彩的家庭式教育氛围的特色;唐文治在主持南洋大学过程中形成了注重提升工科学生人文素质的特色等等。这些都表明,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在遵循办学规律的前提下,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点。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使他们所主办之大学的声誉得到了提升,并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八、通盘筹划学校发展, 创建环境优美、校风纯正的大学

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对于如何办好大学已有通盘思考,这往往反映在他们出任校长时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并且这些校长的施政演说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的作用。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明确告诉师生他想办什么样的大学,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给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给学生的学习和努力指明了方向。梅贻琦在担任教务处长的岗位时,就对清华大学的发展计划、教育方针进行了思考,就任校长时他对今后清华大学的发展发表了五点主张,向师生表明了他对于清华经济、清华地位、清华的人才培养、清华校风、清华在国难中应持的态度以及办高水平之大学的条件等方面的看法,给学生以明确的办学信息。竺可桢出任校长后第一次对学生的讲话就明确告知了他的办学方针,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当时的背景出发明确提出了他在办学过程中将注重的三个方面:即重视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的添置和校舍的建设,并向学生表明他在校长岗位上如何做的态度,随后,竺可桢对他期望培养的人才之标准和希望学校养成的校风进行了明确的论述。如前所述,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中还有诸如王世杰、王星拱、周鯨生、张伯苓、萨本栋、任鸿隽等等,在出任校长时即对如何办学有了

较为系统的思考,在以后办学治校的实践中也多是对最初的办学设想进行丰富和修正而已。

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都期望着把自己主持的学校办成环境优美、校风纯正的大学。因此他们非常注重学校的环境建设,无论是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是人文环境的营造,他们都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一如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所讲:“我喜欢把我们的校园弄得很好看,美丽。……因之我竭力求我们校园的美术化,使得学生处身其中,思想清洁、心身愉快,成为发奋有为的青年。”^[9]在艰难的条件下,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主持的学校大都实现了环境的公园化、绿化、美化和生态化,使他们所主持的大学成为当地的人文景观,成为陶冶人们心灵和情感的精神家园。这些做法得益于近代优秀大学校长所注重的校风建设,这些校长在校风建设上崇尚高洁,追求卓越,讲求大气,排斥功利和俗气,尽可能引导师生脱离低级趣味,营造向善、求真、崇美的氛围。因此在他们的任上都形成了特有的学校精神和传统,诸如北大精神、清华精神、复旦精神、金陵精神等等,这种学校精神的形成是中国近代大学著名校长将学校办成环境优美、校风纯正之大学的重要标志,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 [1] 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38,840.
- [2] 王文俊,等.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29.
- [3] 刘述礼,黄延复.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山版社,1993. 70.
- [4] 竺可桢.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J].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6,248:5.
- [5] 周川,黄旭. 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 367.
- [6] 徐正榜,陈协强. 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03,125-126.
- [7]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48.
- [8] 徐正榜,陈协强. 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125-126.
- [9]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 复旦大学志(第一卷 1905 - 1949)[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268.

(本文责任编辑 许 宏)

来 稿 须 知

本刊自 2001 年起,执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标准,请作者来稿注意如下事项:

1. 来稿请附 100 - 300 字的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以及作者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请使用全称。

2. 请作者提供个人简介:出生年、性别、籍贯、职称职务、博士学位(按十二大学科门类标明类别)以及研究领域或方向。

3. 文后参考文献应著录准确、完整,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如下:

(1)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2) 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 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3) 论文集析出的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A]. 原文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4) 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